

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

李鸿宾 著

中华书局

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

李鸿宾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李鸿宾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9.6

ISBN 978-7-101-13885-6

I.墓… II.李… III.民族关系-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唐代 IV.K280.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0929 号

书 名 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

著 者 李鸿宾

责任编辑 齐浣心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885-6

定 价 59.00 元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9BZS038)最终成果

本书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年度资金资助

序 言

一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墓志所见唐朝的民族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09BZS038)的最终成果^①。

历史学研究的基本逻辑是：研究者阅读史料之后，从史料提供的记述中去寻觅隐藏的信息，由此确定自己研究的问题，再根据史料做深入讨论，用过去常用的时髦词汇表述即“论从史出”。我的这个题目是分明的“预设”：先有自己的想法，将这个想法表述出来，让人家认可你说的有道理，似乎是“那么回事”，然后才同意你立项、做课题。这样的思路导致我们的研究也如同过去习惯性词语描述的那般“以论代史”。20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史学界“论从史出”、“以论代史”几乎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而广为人

^①项目中采用“民族关系”一词系申请时的想法，现在看来欠妥当，缺少时代感。用“胡汉关系”描述更贴近唐朝语境，故本书多取此词以作表达。特此说明。

知^①,过了数十年之后,这些争论的焦点被隐藏之后其实质再一次凸现出来,成为人们讨论问题的前提——预设。这无疑是“以论代史”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姚念慈曾以“统一中国”、“满汉平等”和“康乾盛世”三个词汇概括,作为清史研究的“主流”趋势,其实质是以“预设”的先验性导入去带动具体的研究过程,这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强烈驱动。他说:

清前期是否出现过“康乾盛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应该有不同的陈述和不同的标准。因为这不是一个事实的认定,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论述者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必然会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投射在他的历史研究上。故而他就不能只是一个历史从业者,而且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②

我这里引用姚文的意思是谈论“预设”在先、论证之后的问题,不过话还得再说回来。就我所利用墓志铭文去探索唐朝多民族、多族群之间的关系(这里主要指胡人的汉文化认同),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相关的如《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传世文献和唐人笔记小说之类的记载也时有翻阅和浏览,再加上近年时常接触的墓志等石刻资料,尤其是接触和观察国内外学术同行的研究成果(主要阅读他人的学术作品所得),应当说正是在这些阅览的过程中,自己对唐朝的胡汉关系和胡人的文化认同及其思想

①这是20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末大陆史学界讨论的集中话题之一。

学者们就史学研究中的观点、看法是从史料的阅读后总结出来,还是先有一定的想法或观点后再去看书查阅资料等治学的方式提出不同的意见,形成了所谓“论从史出”、“以论代史”两个迥然相对的流派。

②姚念慈:《“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象牙塔网站 <http://www.xiangyata.net>,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12月8日。

意识等方面常有所思。就此而言,用先有预设、后有论证似乎也不能等同于以往那种“以论代史”的现象。至于怎么评判这样的研究理路,目前还真不好“一言以蔽之”,但姚念慈上述的议论确有敲钟警世的意义。下面,我就本书撰写的意图略作说明。

二

首先我想说说决定本书研究的主旨即胡汉关系与唐朝建国的模式有什么关联。

当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时,如果采用年鉴学派长时段看问题的方法,那么,本书涉及的胡汉关系至少应当列入唐朝将近 300 年的发展和演变的整体过程中去考察,其意义、价值和地位才能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岸本美绪在讨论 16 世纪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共同面临的困难时认为怎样处理民族、宗教的多样性,怎样统治动乱中形成的社会集团而建立一统制度,怎样控制国际商业而实现既稳定又繁荣的国内经济这三方面的问题具有普遍性^①。那么,此前 7—10 世纪之间的唐朝乃至东亚社会是否也有当时贯穿整个社会的核心普及性的问题呢?显然是存在的。陈寅恪曾说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②;日本自内藤湖南既已提出的贵族制与胡汉关系两大主题渗透六朝隋唐之时,亦为今日学者所宗奉^③。可见,胡

①〔日〕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清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 页。

③〔日〕谷川道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总论》,李凭译,载谷川道雄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 年,第 5 页。

汉关系是唐朝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贯通前后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王朝的发展本身就是众多民族共存与融合的产物。从中原的角度观察,根据新近的研究,中原遭遇北方游牧势力的较早年代,应当在西周末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①,汉文史籍中相关的记载也应验了这样的推测,尤其是考古发掘资料的揭示,更加予以强化。后者往往早于前者,当游牧势力发展到能够影响农耕社会的时候,人们才会加以注意。秦汉时期匈奴帝国的建立,宣告了亚洲东部南北政权对峙时代的开始^②,双方各自以边缘地带为争衡的互动从此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的历史进程,甚至有学者认为公元400年到1400年的一千年,是由内亚民族驱动整个欧亚大陆变动的时期^③。在南北互动的同时,还有东西势力不同时期的相继渗入,巴菲尔德(T. J. Barfield)认为,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一直就有游牧政权、中原政权以及东北政权三种势力试图控制草原与中原之间的广大地区,其中,游牧势力依赖中原的资源以提高自身生活的条件,当中原稳定繁荣之时,他们的财富和政治联合亦随之增长;而中原情况恶化时,游牧力量也相对削弱;当中原和草原势

①〔美〕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贺严、高书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8—113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60—117页;〔以色列〕吉迪:《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与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观察》,余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②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156页。

③〔美〕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范威译,《满学研究》第5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97—209页。

力都变弱之时,第三个(东北)势力就进入并填补权力的真空^①。

这里的第三势力进入主体社会应当是在王朝的晚近时期,魏特夫提出的游牧势力介入中原,即唐以前北方势力南下的“渗透”,到辽朝开始步入“征服”,乃至为蒙古、满洲控制他们所能开拓的广远地区奠定了基础,仍不失为一种参照^②。魏特夫(K. A. Wittfogel)的观察是以游牧势力为核心展开的,拉铁摩尔(O. Latimore)则打破了南北各自确立的畛域,他将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势力视作互为补充而非对立构建了各自边缘区的交叉重叠,这样的地区(即传统长城沿线)反而成为了亚洲的核心区,从而在方法论上确立了以双方或多方互动为形式的新解说^③。

唐朝的胡汉关系正是建立在它之前的基础上。作为唐朝整体组成部分的胡汉关系受制于王朝的起家以及由此呈现的特征,早已成为史学家关注的对象并将其视作传统中原王朝的典范。从这个基础出发,唐朝的胡汉关系所依托的背景既不是北方草原势力(如蒙元帝国)的南下征服,也不是满洲入关的控制中原。如

① 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 pp. 8—16; 汉译本见〔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21页。

② Karl A. Wittfogel,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General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pp. 1—35. 汉译本参见〔美〕魏特夫《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唐统天等译,载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95页。

③ 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贯穿其全书,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果说清朝成功的因缘来自于中原的融合进而汉化还是满洲特性仍旧支配尚且存在争论而不能确定的话^①,那么唐朝立国的基础出自中原传统而被赋予典型的中华王朝,除了朱熹等少数人声称李氏与“夷狄”有某种关联之外^②,更多的古人和今人均将其视为传统王朝模式的再现,不存在激烈的争论^③。那么,传统王朝建构的基本模式是什么?毛汉光曾说:

纵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成立与转移,自拓拔氏以云代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为其核心集团,至北齐亡,约二百年;宇文氏自西魏起重新凝结胡汉关陇集团,以关中为其本位,至唐玄宗天宝时,亦约略二百年;自安史乱起,河北河东河南等地之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

①这就是近年来兴起的所谓“新清史”问题。其实质如司徒琳所概括的那样,“这场辩论最终是关于清代是否通过将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带到了一个帝国扩张、政权发展和文化精深的新高度而代表了内亚文化要素的连续活力,还是它是否代表了内亚民族独立力量被外亚农业文明最终淹没的一个相对温和的过程的问题”(《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美国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和问题》,范威译,《满学研究》第5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05—206页)。有关这一问题新近权威的解释,可参见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创刊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6—146页。

②朱熹曾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6《历代类三》,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3245页。

③然而对唐朝统治集团尤其宗室的血统与文化渊源问题,同样存在诸多议论,日本欧美学界一度流行隋唐“拓跋化国家”的说法,亦强烈暗示唐朝北族来源的特性。有关此问题新近的研究,可参见 Sanping Chen, “The Legacy of the Tuoba Xianbei: The Tang Dynasty,” *Multicultural China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p. 1—38。

团,统一而成为各王朝之核心集团,而魏博汴梁一带成为核心区,至北宋建国,亦约略二百年。^①

他总结中古时期政权存续的时间呈现 200 年变化的特征,着眼于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的定位。在他看来,王朝不论大小,建构的模式基本上是由一个统治集团(核心集团)通过武力确立一个基本的活动地区(核心区),以此出发形成的。如他所说,这一模式建立在陈寅恪“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分析的基础上。陈寅恪这两个概念是指西魏的主政者宇文泰为与东魏抗衡而团结自身力量采取的措施,他说,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人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及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远不如东南二者,“故必别觅一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邻”^②。这个凝聚一体的政治集团就是人所熟知的“关陇集团”。以关陇为本位,制定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方针和政策,形成了关陇核心区的措置。

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王德权认为,在古代中国生产力相对微弱、各地域之间的水平联系有限的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形成多表现为一个核心地域集团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建构而获得。在这个脉络下,政治过程表现为“核心-周边”的空间扩充,形成“王畿与四方”的政治空间格局以及以“国”(城市)经“野”(农村)

①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载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②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页。

的政治控制体系。由此看出,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的理论不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古代中国国家抟成之空间过程的一个演示^①。国家政权建设之所以出现“核心集团”与“核心区”,本质上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如许倬云所说,在每一个历史时代,中国的文化与经济的功能,都有其特殊的区域分野,先秦就有了核心区与边陲区不同的发展趋势。核心区人多地狭,文化发展,政治集中;边陲区人少地广,多与主流以外的人群杂处;核心区与边陲区之间则有中间区,它在经济发展上亦有此种特性^②。中国王朝的基本特质就在于国家地域、民族群体均由内外两个层次构成,即本土核心区与周边外围区,前者是王朝依靠的基础,后者是王朝强盛的必备要素,但二者的地位与角色、作用并不等同^③。这两个层次在秦始皇统一之后的王朝循环里,一直是支配各个王朝运行的基础。王德权进一步说,王朝国家形成或帝国统一的前提就是一个拥有相对优势的地域集团(核心集团),以军事征服方式,扩大其支配地域,再以政策、制度与组织的安排,将各地域社会整合进入核心集团为中心的政

①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5期,2006年5月。

②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载氏著《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③李鸿宾:《“二元制构造”下的唐朝华夷观及其变化》,载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128页;《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载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5—175页。这种内外二重性的构造,只是对历史复杂局面的一种抽象式概括,至于是二重性还是多重乃至复合式组合,系由不同角度的观察所得,并非绝对。

治体系之内^①。从这个角度再回过头看陈寅恪、毛汉光中古时期王朝的构建,可以视为其建国之路是传统的沿承和发展的结果。所不同的是,中古时期王朝建构的始作俑者不是传统的中原汉人,而是北方的鲜卑拓跋部及受鲜卑文化影响的汉人,“关陇集团”及“关中本位政策”,都出自北方胡汉融合的系统,宇文泰的目的就是要将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统合在一起以发展其政治势力。不过,随着北周兼并北齐的统辖区域扩大到传统的核心区即内层地域时,中原文化的势力逐步替代鲜卑的成分而渐趋主导^②;到唐朝建国之时,中原文化因素已成为支配地位,陈寅恪论述的隋唐制度之三大渊源均出于中原汉魏法统即是明证^③。

如此看来,唐朝建国的路径与秦汉特别是后者出自中原核心区的差异是,它所经历的途径是由鲜卑拓跋国家建设的道路逐步转向中原传统的模式之中,谷川道雄曾说,隋唐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过程,体现在北周吞并北齐、周隋革命、隋的南北统一这样的进程中,而直接成为这一政治统一进程起点的,则是北魏末期的内乱。内乱既是北魏式统一政治出现破绽、产生分裂的结果,同时也是历史归结于隋唐这样大一统时期的出发点^④。与这种转型伴生的是胡汉关系,确切地说,正是这种关系才支配了这个转型。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唐朝的建构特性:

①王德权:《古代中国体系的转成——关于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新史学》(台北)14卷1期,2003年3月。

②这在府兵制度的演变中突出地表现在胡汉关系的变化,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兵制》,中华书局,1963年,第124—140页。

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叙论》,中华书局,1963年,第1—3页。

④〔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页。

它是从北方鲜卑拓跋国家建构的路径中演变而来,这个过程从胡人政治转向了汉人的传统政治,最终确立了一统化国家的格局。一统之所以出现,正是有胡汉结合的诸多政治的交往与文化融合的促动,倘若没有南北诸种势力的转成,这样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转成过程中,民族或族群(文化)的因素实际上占据了支配性地位,没有它,就谈不上南北一统。也正是这样的局面,才开启了唐朝多民族、多族群(文化)的国家建构与经营维系的历史过程,易言之,唐朝的胡汉关系之形成,本源于其政权建构的多样性。就此而言,它与两汉、魏晋南朝、两宋与明朝这类“纯粹”的汉人王朝相比,存有诸多差异。

三

其次我再说说本书阐释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及其思考角度的问题。

本书所讨论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以后者为讨论的核心。不论唐史学界还是民族史学界,一旦涉及非汉人(即胡人)的“文化认同”,所指的基本是朝向中原儒家为主流的汉文化认同趋势,这已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主导性观点^①。我的这个选题同样建立

^①这里所说的“唐史学界”和“民族史学界”显然是指中国大陆的学术领域,但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尚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和日、韩、欧美等国家,我们在论述中虽然不加修饰限定,但这已成为习惯并被同行所理解。我们研究的视域通常限定在大陆学术的特定语境,大陆以外的研究亦有各自的学术氛围和形成的话语,为使我们的研究更有准确性和有效性,本书在具体叙述时尽可能考虑到作者使用的话语界度及其兼纳性,避免形成自我中心话语的偏颇。

在这种思考的范式上。从逻辑和理论的角度讲,“文化认同”存在着多种选择,特别是在不同文化的交织和碰撞的过程中,其选项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它其实是一种价值取向,但这种取向呈现出的不同面相则需要今人做“事实认定”。不是说言人人殊的意义、价值等等这些主观性的东西不需要今人(指史学专业研究者)做史实上的考证辨别,正是这些主观性极强的认知,更需要我们从当时的语境和互动的层面中去寻觅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事实面相”。就此而言,本书涉及的“文化认同”既是事实本身的澄清,又是观念和意义等价值的认定,而后者是以前者为依托的。本书作者试图要做的工作与其说是“价值的判断”,毋宁说是史事的考证。与此前稍有区别的是,本书考察唐朝的胡汉关系与非汉人(胡人)的文化认同,企图突破旧有的认识框架,从多角度或者从胡汉关系互动的层面去揭示“文化认同”及其取向,试图追寻取向背后的支配性力量和意愿。为此,我们首先要明了现今学术界涉及胡汉关系时人们所持的观点、角度及其特点所在。

在我看来,人们思考胡汉关系大体上呈现出三种思路,即中原王朝(以汉人为主体的)的角度、北方草原游牧人的视野和东亚格局(体系)的整体审视。

从中原王朝角度进行的观察,其特点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地理中心,以汉人族群为主体进行定位^①;其特点是固着于土地

① 牟复礼在评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时将其叙述的思路视为“以汉人为中心”,揭示这种论述和思考模式的逻辑轨道,这的确支配了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论述。〔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36—737页。

的、农耕定居式的、相对固定化的思索,伴随着儒学为中心的伦理孝道与道德评判的中央集权式的主体性思维。天下中心观是这个思考模式突出的特点。中原中心之外是边缘、边地、边疆或四海之地,那些地区与生活其上的族群与中心相比,均属第二、第三位,为中心而服务。这种思考路径的形成源自于中国王朝的发展,即从夏商周各自核心区的产生、向周边的拓展所形成国家(王朝)控制幅度的相对稳定化的认识。易言之,这些王朝的形成,最先都是从一个特定的地区开始,随着势力的扩大不断扩展自身的控制范围、兼统更多的族群,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王朝共同体。秦始皇统一农耕地区之后形成的王朝,第一次兼容了东西南北的农耕之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①。此后历朝历代其发展旨向,基本沿承这一体统而逐步扩展,至清中叶完成了古典王朝运行的模式^②。

中原王朝在中国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历史所呈现的基本趋势大体上可以用中原向四周发展、不断兼容周边进而形成一体化王朝路径的话语概括。这一过程的参与者虽五湖四海,但中原族群的中心作用形塑了中原本位的思考方式,其

①《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②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载氏著《永恒的巨流——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433—478页;葛兆光:《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九州》第4辑(中国地理学专号),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9—132页;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自我中心性构成了观察彼此的突出特点^①。中国中心观之所以能够支配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支配以此为旨向的研究,就在于它能够满足历史时期王朝维持自身地位的合法化以及支撑这种“合法化”行为的观念和思维,也同样支配了依据此种模式进行学术思考的研究者。其自足性的作用显而易见。

与此对应的另外一种观察方式,就是流行于欧美学术圈子的从草原游牧社会的角度出发,或者就欧亚大陆南北不同生活方式的对应观察所形成的认识路径。这种认识关照了欧亚大陆的整体,依据自然生态环境之差异,去认识生活其中的农业社会与牧业社会的民族群体,二者差异呈现的南北对峙与互动,是其观察的核心^②。这种观察有时候超越了单个王朝范围,场面宏阔。在观察欧亚大陆族群活动时,尤其注意北方草原、沙漠中游牧社会的兴衰变迁,也着重游牧族群与南部定居社会的关系。与上述中原王朝观察视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是从南部核心区、核心

①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观察周边外围的思考方式,存在于世界各处,譬如欧洲中心论的叙述模式就是另一典型案例;此类观察问题的方法还存在于阿拉伯、印度等众多地区。有关的论述可参阅〔美〕马丁·刘易士、卡伦·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杨瑾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59页。

②〔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A. M. Khazanov, trans. by Julia Crookende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 *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 eds.,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